

南京社會科學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南京社會科學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4 / 7 JUL.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4

目 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1 深化研究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径 韩庆祥 汤茂明

哲 学

- 10 黑格尔论财富的起源、发展和异化 张东辉 李春晓
18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的技术化生存处境及其突围 段光鹏 王向明

政 治 学

- 27 耦合与超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与效能提升 唐兴军

经 济 学

- 38 不确定条件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韧性测度与提升路径 范 金 孙 颖 张晓兰

公 共 管 理

- 53 从韧性城市到韧性安全城市:中国提升城市韧性的实践与逻辑 朱正威 赵 雅 马 慧
66 法团主义视角下商务楼宇更新的治理模式与路径优化 宗依林 金 俭

新闻传播学·“微短剧”研究专题

- 78 何以“速生速朽” 朱丽丽 何啊龙 马丽丁娜
——微短剧文本叙事、传播势能和受众体验中的加速暴力
89 “零工”片场:微短剧业对数字内容生产的继替实践与零工专业生产模式的兴起 田 元

钟山文艺论坛·“AI 艺术”研究专题

- 100 AI 忆术:迈向完整电影神话的 AI 电影本体论之问 陈亦水
113 人工智能会创作吗? 朱恬骅
——“类文学文本”生成的创造力疑难与集体性方案

人工智能会创作吗？*

——“类文学文本”生成的创造力疑难与集体性方案

朱恬骅

摘要 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从三方面倒转了文学的创作,其中最主要的是追求与文学文本形态相似的文字组合,即“类文学文本”,而非创造出“最不概然”的情境以触及他者。这在根本上有违“创造力”。而从对文本生成技术的历史辩护来看,有关“创造力”的知识论承诺亦无法在当代人工智能中兑现。创造力在技术实践和创作理论中的中心性同时遭到撼动,使之陷入疑难境地。借鉴和发展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将创造力概念从个体延展到集体,可以重建创造力与人工智能和文学的关联。它提示人工智能模型可以成为新艺术形式的载体,为此需要将伦理行动和创作统一起来,通过对话促进对人类共同境况的表达。

关键词 创造力;人工智能;集体性;伦理关系;形态相似性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24)07-0113-09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24.07.011

作者简介 朱恬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上海 200235

自1952年斯特雷奇(Christopher Strachey)编写“情书”程序以来,人工智能文本生成领域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所生成的文本也从初期仅作技术实验和文字游戏之用,发展为如今可满足客服对话、广告文案、文章摘要等多种实际用途。特别是,“语言大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等新技术,已被应用于影视、游戏的台词设计,乃至长篇小说的创作之中。加之此前就有人工智能生成“诗歌”的先例,人们开始追问:人工智能是否能真正创作文学作品?它又将对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为回应这组问题,本文首先借鉴媒介理论家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有关人工智能与书写的见解,指出人工智能能否创作文学作品,关键在于“创造力”。而从早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来看,

人类自身在文学、艺术领域展现出的创造力亦构成其核心关切。然而,当今基于语言大模型的文本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已使这些讨论失去了原有效力,甚至令“创造力”的概念遭遇危机。本文尝试提出一种“集体性方案”,将“创造力”由个体拓展到集体之上,从不同集体中的人们相互沟通的角度,理解人工智能仿照文学文本进行的计算性生成,以求回应和化解有关“创造力”的疑难。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工智能如何才能用于拓展文学与艺术的疆域。

一、“类文学文本”计算性生成中的“创造力”

在1987年的著作《书写还有未来吗》中,弗卢塞尔构想了一种“能够按照正字法规则书写”的人工智能,而且认为这种人工智能同时还是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计算机艺术历史生成问题的人类学美学研究”(21CA169)的阶段性成果。

“进行反思的机器”，“必将引发我们对书写的未来感到忧虑”。^①语言大模型的产生使这种进行“书写”的人工智能成为现实，也的确引发了人们关于文学创作前途命运的忧虑。但是，在陷入这种忧虑之前，有必要首先确认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所进行的，真的是创作吗？

参照弗卢塞尔的观点，人工智能进行的不是创作。从现象学的思想脉络出发，可以得出的第一条论据在于，人工智能取消了文学创作中包含的无数中断。这些中断，既包括一些技术性的和形式上的中断，如给笔加墨、给打字机添纸，或是西文正字法中要求的单词间的空格；更包括生存论上的中断，因为在写作过程中“人们总要停下来喘口气”。^②这些必要的中断促使作者在书写的过程中反复暂停和反思，批判性思维正是在这种反复的中断中逐渐显现。与之相对，今天人工智能完全可以不加停顿地产生出文本来，也不会回过头去修改先前输出的内容，因为它所生成的文本在原理上即是不断将先前输出的内容加入下一轮的输入，经过层层迭代计算得出，直到最终得到标志语段终结的符号，或超出人为限制的符号数量。人工智能进行的文本生成更接近弗卢塞尔所说的前文字、前书写时代的言说，它们顺着已有的内容而“喋喋不休”，并不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③

人工智能进行的不是创作，还可以从“编程”的方面获得揭示。弗卢塞尔将“编程”界定为通过装置并面向装置本身的书写，^④而不是在文学创作的情形中那样，奋力地触及作为他者的读者。^⑤这一变化促使编程的人以截然不同于书写的方式展开思考，批判性思维、历史意识和政治伦理等范畴不再有效，形如“如果……那么……”的功能性命题，取代了具有价值取向的应然命题，只能放在“控制论的、进行计算的、功能性的范畴”之中看待。^⑥编程是对事态的“去价值化”，也只有实现了去价值化的命题，才能得到机器的执行。当前的人工智能系统，是按照人们所编写的程序自动运行的装置。它将文学文本作为单纯的数据来处理，这一过程无疑与浸润了各种价值的文学文本相背离。有作家敏锐察觉到了这一矛盾，指出“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而通过文学书写所完

成的价值传递，是在人工智能面前“人类最后的特点和优势”。^⑦

人工智能进行的不是创作，更可以从“信息”的角度得到论证。弗卢塞尔指出，人工智能属于为传递和保存信息而发明的技术：从手稿的复制、印刷术，到自动化的存储器，它们帮助“主体的自由精神、追求不朽的愿望，与客体的惯性、热寂的趋势相对抗”。^⑧但信息的传递和保存并不等同于信息的赋予，借鉴信息论中对于信息量的定义，弗卢塞尔指出：越是不概然(unwahrscheinlich)，亦即在概率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态，就越有信息，而文学的创作正是这样一种创造不概然情境的行为。所谓“客体的惯性”“热寂的趋势”则截然相反，它们让事态向着最为概然(概率上最有可能)的方向发展。^⑨当前人工智能运作的基本逻辑，是通过计算，使输出文本尽可能接近训练数据，也就是让输出的文本有更高的概率被误认为出自人类的手笔。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以与过往作品的相似程度为标准，而不是以“不概然”为目标。同时，由于人工智能可以持续地自动运作，越来越多相似的文本也被生产出来，从而又在整体上进一步增加了这些文本的概然程度。两相叠加，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过程并不是创造不概然情境的文学创作，反而可能是伪装成文学创作的“热寂的趋势”，使文本越来越概然，越来越相像。这种趋势在当今互联网“内容牧场”(content farm)灰色产业中可见一斑，它们运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低质量内容诱骗人们的点击，降低了搜索引擎检索信息的有效性。

从上面三个方面来看，人工智能所进行的是文本的计算性生成；它对形态相似性的追求，是对文学创作的颠倒——将人在生存论层面做出的表达分解为计算的原材料，将传递价值的文本去价值化为数据，并将对最不概然情形的创造倒转为使概率估计尽可能最大化。考虑到弗卢塞尔将文学创作，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写作，都视为“语言上的创造活动”^⑩，在“信息”的方面发生的颠倒是最为根本的，因为文学创作中所蕴含的生存论表达和对价值的传递，都依靠构建“最不概然”的情境才能有效达成。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是对原有

输入(包括训练数据)的信息保持,是用文本的形态相似性替代了文学价值。因此,人工智能所进行的是计算性生成,而产生的文本也只是类似于文学文本而已。这种文本可以称为“类文学文本”。

说人工智能颠倒了文学创作,也就是说它走向了创造力的反面。海德格尔预言般地指出,它是由计算“事先决定”的,却将计算的过程伪装为创造力。^①这在相当程度上呼应了1842年洛夫莱斯夫人所提出的“计算机不能原创(originate)”这一命题。^②尽管图灵在对洛夫莱斯夫人的反驳中认为,人们可以建造一类进行学习的机器,来获得进行“原创”的能力,正如人类艺术家也都需要经历漫长的学习过程。^③但是这一反驳意见的有效性,取决于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否满足图灵对于机器“学习”的设想——按照他的论述,一台真正能够“学习”的机器应该具有在真实世界中感知和行动的能力,以至于对机器的“教学”应当就像普通的教师教授儿童一样。这显然并不是我们在语言大模型中所见到的情形,因为它所依赖的仍然只是经过筛选的文字、图像数据的集合,而不是一个开放性的、可以与之交互的真实世界。

如此,可以将人工智能的文学“创作”,还原为“类文学文本”的计算性生成,而“创造力”的概念则成为批判这种文本生成的关键。从另一方面来看,技术上对于生成“类文学文本”的兴趣,也确曾与文学、艺术中的“创造力”息息相关。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同时也是人工智能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博登(Margaret A. Boden),曾在20世纪80年代写道:大多数人还没有听说过人工智能,遑论“了解其中最粗略的观念”,而且普遍地“怀疑它对于人们的价值”。^④在此情况下,建构能够产生“类文学文本”的计算机系统,可以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力,而且还呼应了同时期人们对于创造力的关注。

在初版于1990年的《创造性的心智》(*The Creative Mind*)一书中,博登进一步指出,计算机有可能完成至少“看起来”具有创造力的工作,并且“看起来”具有识别创造力的能力,如鉴赏人类诗人创作的诗歌。通过让计算机系统的输出产物,在形态上尽可能地近似于人类的文学艺术作品,

人们可以洞悉某个进行思维的个体,如何构想出自己此前未曾想到过的事物,也就是如何具有和运用自己的创造力。甚至,这样的计算机系统将来还能研究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心智提供某种模型。^⑤在此意义上,生成“类文学文本”的人工智能,承载了一种“知识论承诺”——设计和建构这样的人工智能,将会提供关于人类创造力的知识,所以发展这样的技术是有必要的。

“类文学文本”提供了社会大众容易理解的内容,激发了他们对于人工智能未来前景的想象,而知识论承诺则在学理层面辩护了发展这类技术的合法性。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它们共同帮助人工智能技术获得社会的认可,引来资源的投入,从而推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应当指出,在博登的阐释下,技术研究者们从一开始追求的便只是“貌似”的“创造”,他们没有将“创造力”的概念扩展到机器之上。至于在学理上做出的承诺,也局限在知识论的范围内,并未主张计算机系统的生成物具有某种不言自明的艺术作品地位。如博登所言,计算机本身是否真正具有创造力,实则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这主要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赋予其“创造力”的名称,只是一个立场问题。^⑥如此看来,早期人工智能的研究者们认可了近代以来创造力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中心性地位,并以有关创造力的知识论承诺为基础,确立了发展“类文学文本”计算性生成技术的合法性。这两者共同将“创造力”概念置于人工智能文本生成的中心。

二、创造力中心性的失落与疑难的产生

现在,人们已经使用人工智能产生了大量“类文学文本”,有一些很难与人类的创作相区别。有关创造力的知识论承诺,其技术目标已几近达成。但是,它所许诺的知识却反而更加遥遥无期。这是因为,当前广泛采用的人工神经网络(特别是大规模的深度神经网络)技术路径,已与博登的时代基于规则推理的专家系统方法产生了重大分歧。对于当今人工智能模型表现出的“创造力”,人们只能借助与模型的交互,作出整体论的、相关性的解释,这些模型也仅在作为类型的层

面上是部分可控的,而其内部动辄数亿参数相互关联,已经超出了人们做出因果解释的能力范围。然而知识论承诺所隐含地要求的,却恰恰是还原论的、因果性的解释,因为那种整体论的、相关性的解释,本就能在分析审视他人的创造力时获得,根本无需计算机的介入。既然凭借当前人工智能系统的技术构建经验,不足以增加人们对创造力的认识,那么,追求文本与人类文学作品之间的形态相似,随着知识论承诺的落空也已经失去了根基。

知识论承诺的落空之所以并没有立即取消人工智能生成“类文学文本”的合法性,是因为后者已经从新的时代背景中自证了实用价值。从历史语境来看,与创造力的结合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种种愿景。但当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成熟,这些愿景也就不再为人所需要了。正如一度竞相出现的诗歌生成系统,激发人们设想通用的文本生成技术。而随着真正通用的语言大模型广泛普及,大多数专门的诗歌生成系统已寂寂无闻。对于创造力的模拟不再位居技术探索的中心,它仿佛只具有历史的意义,现已沦为技术发展中的无关项。

情况还不止如此。无论是人工智能的模型作为一种“数学机器”而具有的严格性,还是运行这一模型、系统的电子计算机作为“实际机器”受制于物理法则,它们都具有浓厚的决定论色彩,并与文学、艺术中高扬的创造力形成鲜明对比。即便是在引入了随机性过程、以概率统计为基本原理的人工神经网络中,输出结果虽然可能有所差别,但是这些结果中各方面的特征仍根据一种复杂而确定的概率分布得出,并可通过参数控制(如随机数种子、“温度”参数等)。从而,今天的人工智能在概率模式的意义上仍然是决定论的。

创造力和计算性构成了一组矛盾,复活了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之间古老的二律背反,并将人工智能从依赖创造力的一方,转变为挑战创造力的一方,撼动着这一概念在人类文学和艺术中的中心性。在此考虑哲学家费舍尔(John Martin Fischer)所提出的思想实验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恰与创造力和计算性之间的这组对立紧密关联。按他的设想,有甲、乙两名雕塑家,其中甲创作了一件作品。甲所不知道的是,乙原本也打算创作一件作

品,其形式正与甲所创作的作品相同。只是因为乙看到甲已完成了这件作品,所以才没有自己动手。可以相信,如果甲决定不创作这件作品,那么乙就会创作它,使之留存于世。费舍尔由此断言,甲关于是否创作该作品的决定,同作品本身的存在与否无关,在结果上也没有“对世界造成差异”(make difference to the world)。但与此同时,直觉上甲应当为这件作品负责,这一点又是无法驳斥的。面对这则两难,费舍尔认为,对一事物负责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就这一事物而言对世界造成差别。^{①7}他的这一论证也被称为“无关性挑战”(Challenge of Irrelevance)。^{①8}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无关性挑战所言及的“责任”实际上是为作品负责的作者性,因为创造力所意味着的无非就是“对世界造成差异”的能力,而且它还要求这一差异是“新”的。因此,将费舍尔的思维实验放回文艺创作的语境,它所试图论证的“无关性”实际也就是说创造力与创作无关。当然,这一思维实验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处,如,说乙所设想而未完成的作品,与甲所创作的作品具有相同的“形式”,究竟是以怎样的标准判断的?这似乎关涉一些艺术作品本体论上的疑难。但在人工智能文本生成的情形中,这些可商榷之处反而失去了意义,因为整个思维实验变得相当容易理解:设定相同的参数和上下文,同一个模型将能给出一致的文本输出,这使由“谁”进行文本生成变得无关紧要。甚至,语言大模型已经可以使人们在几乎不介入任何技术进程的情况下得到“作品”。一个人可以“无所创造”而成为“作者”,意味着无关性挑战中的假想,已经成为时刻能够上演的现实。

当前人工智能的文学“创作”不仅没有说明什么是创造力,而且还提供了一系列的具体事例,撼动了创造力的概念在探析文学和艺术问题时的必要性。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决定论性质,我们似乎不得不认可上述无关性挑战,将创造力同创作分离。但这样做也就意味着,围绕“创造力”的概念而建立的一系列文学、艺术批评,都将遭受重创。可见,创造力不仅在实践上成为无关项,而且在概念层面有被彻底驱逐的危险。这种状况构成

了“创造力疑难”。这一疑难不容易解决,即使是采纳某些论者的观点,将“创造力”从人推广到非人行动者上,¹⁹也无法将它消除:不可解释的人工智能系统仍然无法提供关于创造力的新知识,它只是获得了“机器创造力”之类的新名称,而它们所拥有的这种非人创造力将反过来使人类的创造力不值一提。在此情况下,我们是否还有可能挽救“创造力”的概念?

三、创造力概念的集体性拓展

注意到,博登所说的“创造力”局限于个体层面,但弗卢塞尔所说的“语言上的创造活动”,却是由古往今来无数作者共同参与的结果。这一点在无关性挑战中尤为明显:“对世界造成差异”的人为因素,不仅限于署名的个体。仍以他所设想的甲、乙两位雕塑家为例。虽然甲的决定并不影响作品终将存在的结果,但这种观点只有在把甲乙两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时才有意义:尽管乙并没有署名,由甲、乙两人所构成的雕塑家集体才是“使原先不存在的某作品存在”这一差异的制造者,并且这一差异无疑也是“新”的,符合我们对创造力的认识。换句话说,即使最终结果由于某种原因(如人工智能模型的计算性原因)而被注定,某个个体的创造力变得无关紧要,这一个体仍可能通过与其他个体共同组成一个集体,来施行创造力即“对世界造成差异”。这种需要从集体角度看待的创造力,可称为“集体创造力”(collective creativity)。

集体创造力的事实证据古已有之,世界各民族代代相传的民间文学就是其中的显例。19世纪,格林兄弟提出了“人民创作”(Das Volk dichtet)的口号,“人民”可以作为一个集体来“创作”作品。²⁰这一口号衍生出的“集体性”概念,成为民间文学的奠基性特征。经过数代学人的发展,²¹目前集体性的主要内涵,可以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形式的沿袭性、内容的共同性、时空的有限性和历史的变异性。²²不难看到,人工智能对于“类文学文本”的生成,体现了这四方面的特征。

首先,在形式的沿袭性和内容的共同性上,先前已受评论家关注的“小冰”“九歌”等诗歌生成

系统,运用了能够反映一个时代、一种文学体例典范的文本构建数据集,具有传世价值的作品被设定为人工智能“模仿”的对象,沿袭了名家名作的表达方式和内容,造就了“类文学文本”之于文学文本的形态相似性。又如,“九歌”的设计者将《平水韵》的韵目加以编码,并与知识图谱相结合,引导模型生成形式上合乎近体诗用韵,而在内容(遣词造句)上也更贴近古人的文本。²³新近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小说”《天命使徒》,²⁴则糅合了多种流行网络小说的背景设定与情节设置,反映出此类文本在语言大模型训练中的广泛使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文本,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同时约束了人工智能的生成过程,使古老的形式得到沿袭,共同的内容得到显现。

其次,就时空有限性而言,无论设计者如何选择,最终构造出的数据集都是有限的。即便是出于通用性目的,广泛搜罗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文学文本构建起来的数据集,终究也还是受到语言材料自身来源的时空限制,从而令人工智能模型无可避免地倾向于其中数量占比更高的语义内容。数据集的这种有限性,确定了人工智能模型本身的时空有限性。而使用者们带着自己的意图和理解向人工智能提出要求,也让生成的文本进一步受制于使用者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约束,以求获得该时该地公众的认可,时空的有限性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加强。

最后,从集体性作为“历史的范畴”所允许的历史变异性之中,我们还获得了直接使用集体性这一术语的合法性。“类文学文本”携带了设计者和制作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对相关体裁、内容的理解,并通过技术的继承、变异而相互影响,这本身就是集体性发生历史转变的证据,它显现了古老的“人民创作”与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连同被它改变的生存境况一道,彼此适应、相互融合。人工智能模型将集体性推向了新出现的技术层面。

而且,与民间文学的情形一致,人工智能对“类文学文本”的生成同样体现了个体和集体之间辩证转换的关系:个体来自集体,而集体由个体所构成。先前学人在指出民间文学的集体性与作家文学的个体性差异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即便

是最“因循”的故事讲述人,也在为其所在的集体贡献自己的智慧。钟敬文指出:“民间文学的集体创作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由世代代千万个人民艺术家的创作成果凝聚而成的。”“其中也包含有个人成份,总是先由个人创作出来,经过集体传播和加工,才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②5}哈拉普(Louis Harap)在论述民歌时也指出:“更基本地,对于那些作为主动的听众而参与创作的人们而言,个体的歌手是其代表。”^{②6}在人工智能模型中登场的“李白”“杜甫”或“刘半农”“沈尹默”,又甚或是“南派三叔”“猫腻”,都作为各自领域和阶段内具有突出代表性的个例,凝结并概括了相应的文化集体。

鉴于集体性基本意涵在建构和运用人工智能生成“类文学文本”的过程中体现,由此生成的文本可以把握为集体创造的产物。参照艺术史家沃尔夫林关于“风格”双重来源的论断,^{②7}可以说:有一种属于个体的文学,它标举个体创造力而进行具有独创性的、具名的表达;但与此相对,也有一种非个体的、更多展现出遵从性表达的文学。人工智能有赖于模型、算法的反复演算,为输入的数据、模型结构及参数权重等技术因素所决定,表明它更多地属于后者。这帮助我们看到先前知识论承诺等对创造力的认识是狭隘的,只顾了个体层面的心理过程,而未能看到集体创造力结出的丰硕成果。集体性为建立集体创造力提供了基础,也显示出其与个体创造力的区别与联系。

这样,知识论承诺获得了新的内涵。它许诺为我们提供的知识,不再是关于内省的心理能力,而是为集体创造力提供综观:人工智能生成的“类文学文本”为人们提供了样本,人们可以通过它们直观地认识到某些集体在文学上所具有的创造力。同时,把所有与作品生成相关的人们视为一个集体,他们所作所为的总和,显示出“对世界造成差别”的力量,可以化解无关性挑战。诚然,有一些个案显示出,人工智能模型使用者的个人创造力是值得怀疑的,而人工智能生成物作为计算模型的输出,是以计算的方式预先确定的。但是集体创造力可以轻易化解这些批评:即使只是从人工智能模型那里获取输出结果,人也并不仅

以个体的名义来行动,而是作为各自所属集体的成员来行动,如此行动的结果(获得的文本)实际是整个集体共同的产物。

“集体创造力”的概念能够解决人工智能文本生成所引发的创造力疑难,重新建构了创造力与人工智能、文学、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如果说文学和艺术一样,其发展有赖于动态而多元的概念扩张;^{②8}而在形态相似性的主导下,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中,对过去文学沿袭性的再现占据了主要位置。这就提出了如下的问题:集体创造力何以不仅是一种量的层面的“生产力”(产生大量“类文学文本”),而且能够提供质的“创造”,也就是产生新的文学流派、体裁,乃至新的艺术门类?

四、文本生成的艺术:一种集体性方案

集体创造力体现了“集体性”,但是细究之下不难发现,在人工智能的境况下,所涉及的“集体”已悄然发生了分化。一方面,存在着为表达提供方式和内容的集体,它主要通过数据集的选取而产生,并且往往由获得人们广泛承认的作者所组成。即便是看似“无所不包”的语言大模型,来自正式出版物和权威网站的信息,依然是其训练数据的主要来源,文本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认可。但不同于文学流派或团体,这一集体又是开放的、非本质的:不仅同一时代、同一体裁的作者能构成这样的集体,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者完全可能在同一个集体中相遇。只要人们做出某种标签式的定位,无论是“现代诗人”或“格律诗人”这样的既有范畴,还是像“按照作品的可得性而组成”这样完全出于实践方面的理由,都可以建构出相应的集体。

另一方面,还存在着设计、实现、运用这类人工智能模型的集体,我们可以将他们统称为人工智能模型的操作者。这些人或是收集、操纵数据,或是编制模型的结构、设计相关的算法,或是编排整理模型输出的文本并赋予它们某种意义。相对于已有的作家作品,这一集体显然是后起的。然而,正是由于他们调用了作者的文本材料组成了数据集,才使前一个集体得以出现。考虑到文本的表现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选择,从根本上说,他

们才是具有主体性的、进行表达的集体。

这意味着,进行“类文学文本”生成的人工智能虽然体现了集体性,却涉及两个不同甚至对立的集体。在视觉艺术的领域,马诺维奇(Lev Manovich)曾用“图灵领地”与“杜尚领地”来指称这两者相互对立的状况。^②而在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中,决定表现形式的集体(“杜尚领地”),较于进行表达的集体(“图灵领地”)而言总是从属的,前者由后者决定,在技术工作中遭受摆布。对于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而言,就在作者标举个体性之处,操作者们却抹去了他们的姓名,强迫他们进入某个事后建构的集体之中。这从根本上塑造了二者的不平等地位,酿成了二者间争论不断的局面,不断动摇着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在社会层面上的合法性。

为使人工智能的“类文学文本”生成维持必要的合法性,首先需要在两个集体之间建立对话性的关系,以将文学作者的集体纳入技术操作的行动者行列,容许他们在非此即彼的“参与/不参与”之外,更进一步地就“如何参与”做出贡献。集体的构建和集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与文本生成的技术操作并行的行动空间。这一行动空间是伦理的,因为它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关乎诗人、小说家与算法、模型和代码等的作者和技术研究者如何相互协作,参与从数据集的构建到对输出的文本进行阐释的全过程。固然,这两个集体或许难以像民间文学所标举的集体那般浑然天成、难分彼此。但追求对话性的伦理关系,让不同的集体之间获得碰撞和融合的机会,却可以起到规范性的作用,引导集体的成员摆脱相互对立的困境。

同时,两个集体之间的区隔和对立,也体现了二者在文学意义上相关性的缺失。特别是当“图灵领地”的人们能够借助人工智能模型,调动那些并不属于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时,这种缺失就显现得尤其明晰,让两个集体表现为偶然结合乃至强行并置。操作者们虽然可以声明模型设计和建构中体现了对文学体裁和艺术风格的朴素观察,并将这种观察以技术上的表征形式(数据、目标函数等)固化,但这无法自动产生文学上的意

义,仍然需要文学的集体予以承认并参与阐释。因此,两个集体之间建立怎样的伦理关系,还决定了将何种意义赋予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类文学文本”,并最终规制和调节了它们在文学和艺术上的内涵和价值。这要求在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中,伦理关系应当从一种关于既成作品“社会功能”的事后讨论,前移到作品的创作阶段,伦理的行动空间必须同时成为文学的行动空间。此时,生成“类文学文本”的人工智能模型,也就担负了沟通现实中分属不同集体的人们的作用。

在强调两个集体之间差异的同时,还应注意,在所谓“图灵领地”和“杜尚领地”之外,存在着一个包容二者的总体范畴——“人类”的“类存在”。在人工智能系统面前,它构成了在文学和艺术上“对世界造成差异”的最大集体。“杜尚领地”中人们所创造出的作品,并不是形式与内容的重组混合,而是体现了他们的艺术追求和与世界的表达性关联;“图灵领地”所设计、构建和使用的人工智能模型,也不是一种纯粹数学的构造,同样无可避免地浸透了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观念。二者存在相互呼应的基础,关键在于对此产生自觉的意识,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过程并非完全自动,它依赖集体以获得意义;每一次的文本生成也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对于人与世界表达性关联的一次揭示。由而,人工智能虽不事“创作”,人工智能模型本身却可以是两个集体共同创造的作品,用以表达当今人类在高技术条件下共同的生存境遇。这呼应了弗卢塞尔所说的那种作为“小说与诗歌的后继”的“计算机艺术”,它如同书信一样,是沟通自我与他者的“主体间性的艺术”。^③

在将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模型转化为一种可能的艺术作品形态过程中,我们始终以“集体性”的概念为指引,因此可称其为“集体性方案”。按照这一方案,集体创造力通过将两个集体之间的伦理关系纳入文学而拓展了文学的边界,通过将人工智能模型这种技术构造物视为两个集体的共同创造而扩展了艺术的范畴。同时,“集体”也为原本处在相互关联中而不自知的人们,提供了认识这些关联的方式,促使他们寻求并体现人类的共同

境遇,丰富了人与世界的表达性关联。这些都展现了集体创造力作为一种创造力所应有的功能。

五、结语

在人工智能对于“类文学文本”的计算性生成背后,呈现出人们一以贯之地通过各种方式、运用各种技术进行表达的意愿。正是这种意愿,促使着艺术从洞穴中的壁画穿越数十万年的历史而走向人工智能的时代,并在“集体性方案”中呈现出人工智能模型作为艺术作品的可能性。所谓“后创造力”或“后人类”的理论立场固然激进地显现了人工智能艺术的理论冲击,然而属于人类的“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依然是内涵与价值的源泉。

集体创造力开拓了一种以集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为抓手,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为导向的创作。对于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而言,也就是将它从隐喻性质的“创作”,转变为通往一种名副其实的新文学形式,乃至通往未来艺术门类所凭借的技术方法。一旦扬弃对于“类文学文本”形态相似性的片面追求,人们将能够真正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创作方式。

注:

- ①②③④⑤⑥⑧⑨⑩⑪⑫⑬ Flusser V., *Die Schrift: Hat Schreiben Zukunft?*, Göttingen: European Photography, 2002, p.10, p.22, pp.67-68, p.57, p.11, p.17, p.15, p.59, p.37, p.105.
- ⑭ 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读书》2017年第6期。
- ⑮ Heidegger M., *The event*. Richard Rojcewicz, trans.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31.
- ⑯ Lovelace A., *Translator's Notes to an Article on Babbage's Analytical Engine*, *Scientific Memoirs*, 1843, 3, pp.691-731.
- ⑰ Turing A. M.,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1950, 59(236), pp.433-460.
- ⑱ Margaret A. Bod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tural Man*, London: MIT Press, 1987, p.3.
- ⑲⑳ Margaret A. Boden, *The Creative Min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16-17, p.17.
- ㉑ Fischer J. M., *Responsibility and Self-Expression*, *The Journal of Ethics*, 1999, 3(4), pp.277-297.
- ㉒ Hu J., *Reasons - Responsiveness and the Challenge of Irreleva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2023,

6(4), pp.762-778.

- ㉓ Valverde-Pérez N. and Negrete-Yankelevich S., *Creativity, Co-evolution, and Computerized Coproduction: Reframing Creativity from a Nonanthropocentric Approach*, *Adaptive Behavior*, 2018, 26(5), pp.239-256.
- ㉔ 胡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1921年第1期。
- ㉕ 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集体性”的概念可追溯到1935年钟敬文提出的“集团性”(参见钟敬文《民间文学学的建设》,载《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李长之在两年后撰写的《略谈德国民歌》一文直接提出了“集体性”(参见曹成竹《“天才的”还是“集体的”:关于歌谣归属的文艺论争》,《民族艺术》2016年第5期),而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郑振铎又将“俗文学”界说为“无名的集体的创作”(参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4页)。
- ㉖ 刘守华:《民间文学概论十讲》,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姜彬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 ㉗ Guo Z., et al., *Jiuge: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Generation System*, *Proceedings of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System Demonstration*, 2019, pp.25-30.
- ㉘ 王芊霓:《探索文学可能性,华师大发布首部百万字 AI 小说〈天命使徒〉》,澎湃新闻,2024-05-2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513636. 访问日期:2024年6月10日。
- ㉙ 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6页;姜彬:《论民间文学的特征》,载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论丛》,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6页。另外参见吴蓉章《民间文学理论基础》,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载有“单是集体性还不能完全概括民间文学创作和流传的特点,它是集体性与创作个性的结合。”刘魁立称“一般地说,民间文学都反映人民群众对现实世界的集体的认识,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 ㉚ Harap L., *Social Roots of the Art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9, p.120.
- ㉛【瑞士】海因里希·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潘耀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 ㉜ 钱立卿:《概念扩张问题的多重面向——以“艺术”概念为例》,《哲学研究》2021年第2期。
- ㉝ Manovich L., *The Death of Computer Art*, *The Net Net*, 1996-10-22. <https://rhizome.org/community/41703/>. 访问日期:2024年6月10日。

[责任编辑:青末]

C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rite?: The Difficulties of Creativity and Collective Solution in Generating “Para-Literary Texts”

Zhu Tianhua

Abstract: AI text generation has reversed “writing” in three aspects. It seeks to create combinations of words that resemble literary texts morphologically, i.e. “para-literary texts”, rather than creating the “most improbable” situations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which fundamentally contradicts “creativity”. When it comes to the historical defense of t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the epistemological commitment regarding “creativity” can neither get fulfilled by contemporary AI. The centrality of creativity is being challenged in both practice and theory, rendering it even more perplexing. By drawing on the “collectivity” of folk literature and extending the concept of creativity from individuals to collectives, we can reconstru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reativity, AI, and literature. It suggests that AI models can be a medium for a new form of art, requiring the unification of ethic actions and artistic creation, to express shared human condition through dialogues.

Key words: creativ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llectivity; ethical relationship; morphological similarity

(上接第 88 页)

Why “Quick Growth and Rapid Decay”: The Accelerated Violence in the Text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Potential and Audience Experience of Micro-short Dramas

Zhu Lili & He Along & Ma Lidingna

Abstract: Under the multiple logics of cultural change, capital profit-seeking and technology embedding, micro-short dramas have quietly stepped onto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the media. Micro-short dramas are not only fast-growing but also fast-fading. Micro-short dramas accelerate text narratives with fast-paced, strong reversal narrative styles, big-head portrait mode, and brainwashing sound effects. The strategies of data algorithm-driven, multi-platform linkage and automatic jump accelerate the communication potential of micro-short dramas. Under the situation of dual acceler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ext, the audience experience also begins to accelerate, forming a continuously addictive viewing mode, and an alternative new emotional practice is unfolding in the meantime. The accelerated logic of micro-short dramas implies accelerated violence, which is manifested as a form of power domination. Micro short dramas accelerate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audience’s scarce attention resources, alienating life time into production time; they also accelerate the devouring of the subject’s emotional breathing ability, exacerbating the alienation of cultural stamina. The audience need to cultivate their own concentrated thinking ability to coexist with accelerated violence; for the industry, they need to strive for an elegant culture, expecting fast growth and slow success to achieve healthy development.

Key words: micro-short drama; speed; accelerated violence; attention; alienation